

北朝墓葬乐器图像初探

文\王 娟

摘要：北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文化包括音乐无论是自身固有，还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侵占掠夺，抑或是掌握政权后别国的文化进贡，总之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以西凉乐和龟兹乐为主干尤其以龟兹乐为主的独特的胡部舞乐文化，墓葬中涉及音乐方面的处处可见的“胡腾舞”便证实了这一点，

为唐盛世的发展到顶峰的体现民族大融合的“十部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北朝 墓葬 乐器

一、北朝历史简述

历时约16年之久的晋室“八王之乱”(公元291年至公元306年)，彻底动摇了汉族内部统治，西北诸族相继大举进犯中原，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北方开始了长达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十六国后期，一个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落逐渐强盛起来，拓跋圭(北魏道武帝)从386年建国之初，就非常重视汉族文化，很快，在他的亲汉举措不久打败后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权(386-534年)之后，又消灭各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部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中国北方开始进入北朝时期。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继承北周疆域的隋由于灭亡南朝陈，完成了统一大业，所以没有被称作北隋，而是被后世单独称为隋朝)。

北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经历了结束汉晋以来的长期战乱、北朝政权由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完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一系列改革后，最终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安集到融合，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掀开了中国古代长河中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绚烂的一页。有关这一时期一系列墓葬的考古发现是对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

二、从北朝墓葬考古发现看北朝音乐

纵观这一时期的墓葬考古发现，有关音乐的部分主要可以分为壁画、浮雕类和乐俑三大类。壁画浮雕中体现有关音乐图像主要有三种：飞天伎乐图、仪仗鼓吹图和家居宴饮图。乐俑可以分为马上乐俑、坐乐俑、站乐俑、舞俑和胡人俑。这些音乐图像、乐俑主要围绕着三个主题：表现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气派出行的仪仗乐；表现墓主人生前富贵享乐的宴饮乐；表现墓主人希望死后能借助宗教升入天国后仍能享受生前富贵欢乐的美好愿望的飞天伎乐。本文主要从这三个主题方面着手进行讨论划分，飞天伎乐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宴饮主题的升华，只是演奏的主体由人变为神，所以三个主题中又以仪仗乐和宴饮乐为主。这些图与俑中还包含有关杂耍及乐器配乐的百戏场面以及胡乐俑的独特形象。

北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文化包括音乐无论是自身固有，还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侵占掠夺，抑或是掌握政权后别国的文化进贡，总之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以西凉乐和龟兹乐为主干尤其以龟兹乐为主的独特的胡部舞乐文

化，墓葬中涉及音乐方面的处处可见的“胡腾舞”便证实了这一点，为唐盛世的发展到顶峰的体现民族大融合的“十部乐”奠定了基础。有关北朝墓葬出土的音乐图像资料整理略。

三、北朝墓葬乐器图像的分类及编制

根据音乐图像所要表达的意义，将图像分为三类：

飞天伎乐类 仪仗鼓吹类 居家宴饮类。划分的依据前文以述，兹不赘述。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图像类还有百戏杂耍的场面，但大都依附于出行图中，属于仪仗队伍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杂技俑与骑马俑一同出土，很可能也在仪仗队伍里，也有可能是在宴饮乐上表演，这里不做更深的讨论，暂时不把他们独归一类。

(一) 飞天伎乐类

飞天伎乐图主要出现在与粟特贵族，尤其是萨堡首领有关、信仰祆教的墓门或石椁石床上。如北周安伽、史君墓，还有日藏入华粟特人石床榻、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北朝围屏石榻多出现了与祆教色彩有关的伎乐图像，而史君墓中飞天伎乐的形象更丰富一些。飞天形象组合以偶数居多，2人组合最多，所执乐器通常为左箜篌、右琵琶。也有4人、8人等，4人组合乐器通常为琵琶、箜篌、横笛、排箫。也有不对称的情况，如史君墓中东西门框各有飞天5个，但执乐器的只有7个乐器增加了笙簧、螺等吹奏乐器。伎乐飞天往往和祆教火坛祭祀联系在一起，通常在火坛上方两侧，但有的伎乐形象虽然在火坛祭祀旁，而且头后有飘带，但其形象还是与飞舞着的飞天伎乐有所差别。总之，除2人、4人组合最为常见外，其他并不完全统一，而且飞天伎乐只出现在与粟特贵族有关并且信仰祆教的信徒有关，且主要集中在北齐北周时期。

(二) 仪仗鼓吹类

仪仗鼓吹是常见的一种题材，因为鼓吹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用于出行依仗、朝会宴享和丧葬。吴钊、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类大全》里对鼓吹的解释为：鼓吹按所用乐器和用途的不同，可认为鼓吹和横吹。横吹主要有鼓、排箫、笛等乐器组成。其中由建鼓与箫、笛在朝会宴飨时演奏的称“鼓吹”或“黄门鼓吹”，由提鼓与箫、笛在马上作为出行依仗演奏的专称“骑吹”；由提鼓、箫、笛、铙在马上作为军乐演奏的称“铙歌”或“短箫铙歌”。横吹又称鼓角横吹，一般由鼓、角、横吹(横笛)等组成，有时加用笛或排箫。鼓吹又可以分为骑马鼓吹和步

行鼓吹两种。

可见鼓是必不可少的乐器，决定鼓吹乐用途的为吹奏乐器。对于南北朝时期鼓吹的讨论，《关中地区十六国墓的初步认定》——兼谈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鼓吹俑一文已经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上一段文献的出处就源于此文。

此文附表列出了西晋至北朝墓葬出土的统计表，对照此表以及有关北朝墓葬出土的音乐图像资料的30多座墓葬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为：乐队的编制上，尽管出土的鼓吹乐俑编制混乱，从2致23人，但10人编制以上的还是占极少数，10以内的编制较多，几乎从2到10都有，但还以2、4编制占多数。鼓吹又可以分为骑马鼓吹和步行鼓吹两种。但同时拥有这两种鼓吹的占极少数，这个《关中》一文也观察到了。北周以后的步行鼓吹俑几乎没有，而骑马鼓吹俑则增加了各种除笛以外的管乐，鼓的数量也很少。相反从西晋至北齐，鼓吹乐队中鼓是最基本数量最多的，而且鼓多为鼓面朝上固定在左腰间的扁圆形。其次是角，这两种乐器搭配最多。最少的是箫、笙等管乐，数量少，出现的频率相对而言也是最少的。还有一点发现不很确定。与粟特贵族祆教色彩强烈的有关考古发现里少有有关鼓吹依仗乐。相反与鼓吹乐出土比较多的墓葬里几乎没有祆教色彩。

(三)居家宴饮类

这类信息出土是最多的。无论是祆教色彩浓烈还是气势庞大的鼓吹仪仗乐，总有有关宴饮的乐俑、图像同时出土，而且有条件享受艺术的只有帝王贵族和有地位的官员。音乐与富贵的生活总是紧密相连的。这一时期的音乐多为舞蹈(胡腾舞)或其他舞蹈伴奏的，这里不对舞蹈进行探讨。单从乐队的编制上来看，基本都不超过10人。而且没有很固定的形式，10包括10以下的几乎都有。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几人的乐队，哪怕是一个人的独奏都少不了琵琶，可见琵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唐朝盛世琵琶是最为盛行的乐器，这与琵琶在北朝时的兴盛是分不开的。一般两人乐队比较少，因为在宴乐里至少有琵

琶、五弦、竖箜篌、排箫、细腰鼓，3人到6人的乐队也比较常见，这样的乐队编制往往把最基本的丝竹乐器包含了进去。乐队中还常常出现笙、铜钹、篳篥等。如果乐队编制再大一些，最主要就是增加弦乐的数量，其次加一两件打击乐或管乐，如鼓、螺、贝等。总之乐队的乐器就是常见的几种，且搭配比较灵活。从乐器种类上看，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中原原来流行的大型青铜乐器如钟、磬、铎、铙等几乎不见，尤其是钟磬类。相对而言能够出现在乐队中的，最常见的是笙。箏、阮也能见到但不常见，除这些相对流行的丝竹乐器外，可能北朝早期由于受汉晋文化影响，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石质吹孔乐器如龠等，例如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乐器汉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从乐伎性别上来划分，由于掌握的信息比较少，资料上能看到的画面又不甚清楚，所以从这个方面谈论应慎重一些。总的来讲，伎乐形象还是男性比例远远多于女性，因为仪仗乐全部为男性，宴乐上的男性形象多于女性。有的甚至全部为男性，如安伽墓围屏石榻。宴乐乐队全部为女性的占一小部分，有8人组合等。男女乐伎混合的也有一部分，就目前能分辨清楚的情况来看，有一种情况相对多一些。男主人旁为男乐伎，女主人旁为女乐伎，两支队伍共同组成一个乐队，如徐显秀墓。乐队的队形，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的队形比较规整，通常在舞蹈者的左右两侧对称而坐。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常常相对自由的站在或坐在主人的周围演奏，这种图像也常常见到。

关于“缘榼”“跳丸”等百戏及乐队场面，资料中也显示了不少，但由于资料有限及俑残比较严重或壁画漫漶不清，所以只谈几点相对肯定的看法。表演者基本都为胡俑，最常见的是表演“缘榼”。这样的比例反映出这种杂技的流行程度。如宋邵祖墓出土的胡俑4人组，以及看到的其它两个仰天嘴张的胡俑，虽然都没有乐器形象，这种俑的体型特征都比较明显，体肥而短，而且头仰的幅度较大而且非常专注，不像是演奏乐器，弦乐、打击乐仰头幅度大恐怕无法完成，就

算是陶醉，幅度也不可能那么大，管乐需要气息支撑仰头幅度大更不可能完成。根据嘴大张判断吹某种乐器的看法我不太认同，更倾向于“缘榼”类的表演者或者负责安全的角色。

“缘榼”“跳丸”等百戏表演常常带有乐队伴奏，常见的有琵琶

和鼓类。如大同智家堡北魏墓三女子演奏琵琶前进，后有2人表演“缘榼”，旁边三人做倒立、腾空动作，另两名身着鲜卑服男艺妓正在表演“跳丸掷剑”的场面。

四、结语

北朝时代虽然动荡不安，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统一的趋势。隋唐时代的兴盛是以政治稳定统一为基础，而北朝历经民族文化融合的巨变正是跨入隋唐昌盛时代的关键一步。北朝使用的乐器，大都适合在马上演奏，与游牧民族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在音乐文化方面，经历了与汉文化的碰撞，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吸收西域音乐特色的鲜卑特色文化，为盛唐的音乐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中国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周谷城著，1957年（2002年重印）。
- 2、李凭《北朝的发展轨迹》，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的《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页1~11，科学出版社，2006年。
- 3、德凯琳（Catherine Delacour）黎北岚（Penelope Riboud）《巴黎吉美博物馆展围屏石榻上刻绘的宴饮和宗教题材》（施纯琳译），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的《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页108~125，科学出版社，2006年。
- 4、荣新江《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的《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页126~139，科学出版社，2006年。
- 5、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4，6月版。
- 6、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发行，2008年1月版。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硕士乡宁一中教师）